



周刊

中国科学报

2012 年 07 月 23 日

周一出版

主编视点

思想家的价值

每个人都会思考,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思想家。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称得上思想家的,是创立了某种独立思想体系的人,是能够启发当代、影响后世的智者。

人类不能没有思想,也不能没有思想家。在东西方历史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卢梭、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一些为社会、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思想家,不啻为人类前进历程中的明灯。

思想家是同时兼具想象力与理性追求的人。他们的成果,是不断思考现实、深刻叩问人生的结果。



卢梭

《社会契约论》展开全面批评。严复继承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断言人非生而自由平等。他指出,绝对自由的教条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系破坏,不可亿计。”但总体而言,这种温和派的声音在晚清与民国期间是相当微弱的。

最近 30 年,卢梭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似乎又在重现。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在长期思想禁锢后开始重新认识西方思想的价值。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一次成为知识界了解西方近代自由、民主理念的重要著作。一时间,卢梭又成为人们谈论、争论的对象。思想开放者视卢梭为自由主义的代表,而保守人士则警告卢梭的思想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无政府主义。尽管双方对卢梭的爱憎泾渭分明,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卢梭代表了西方近代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主流。

然则,这种共识很快便消失了。随着人们对西方学术发展的了解,西方对卢梭的批评开始影响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以哈耶克关于英国式自由主义与法国式自由主义的分野为基础,剖析卢梭思想中反自由主义,甚至“极权主义民主”的成分。他们指出,卢梭的学说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毋宁说是集体主义的。卢梭公意理论的实质是牺牲个人利益以追求更高的集体目标。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卢梭思想中对合法性的追求、对民主参与的肯定以及对平等的向往具有永恒的价值。

应该说,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会遭遇形形色色的解读,受到各种合理或过分的批评。由于卢梭思想已经成为人类精神财富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今天我们在纪念卢梭诞辰的同时,有必要认真研究卢梭的思想,理性地反思他的贡献及理论导向,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启迪,为思考我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对卢梭尚须更全面的解读

■本报记者 郭勉愈 ■实习生 郑毅

然而在历史上,很多本来具有重大启蒙作用的思想,问世时首先遭到的是社会的抗拒,这也使思想家常常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面对社会的压力,康德曾经说过:“我没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我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这或许可以视为思想家的底线。

因此,思想家的价值不仅仅表现为他们的思想成果,同时体现在他们对思想活动的态度上。他们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独立思考的捍卫,对信念的坚守,使他们的人格与他们的思想同样散发出永恒的光芒。

“既已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之中度过余生,我将竭尽灵魂的全力去挣断时论之枷锁,勇敢去做我认为善的一切,毫不顾忌他人的毁誉。”这是卢梭《忏悔录》中的一段。卢梭一生命运跌宕起伏,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对人性与社会的思考。

300 年来,卢梭的思想激发了迥然各异的回响。有人说他是启蒙者与先行者,有人说他是不负责的个人主义者,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内部也一样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他的对手、英国人柏克曾经说过:“倘若卢梭尚在人世,在他神志清醒的间隙,也会被其弟子们的疯狂实践惊呆。”

卢梭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中,他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卢梭主张人民与政府之间签订契约,人民通过出让天然自由,服从群体的公意,从而获得公民自由。同时,卢梭强调人民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人民拥有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神圣主权。为捍卫自由与平等,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卢梭自己最喜爱的作品是《爱弥尔》,又名《论教育》。卢梭为主人公爱弥尔设计了成长的不同阶段可能遭遇的种种陷阱与危机,进而提出合理的应对方法。卢梭写道:“生存是我要教给他的职业。我放开手时,他并不需成为法官、士兵或教士,他首先应是一个个人。”他认为不应该把适应社会作为教育的目的,而应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并帮助他们积累人生经验。《爱弥尔》在当时引起轰动,几乎成为人手必备的育儿经典,然而在出版后不久即被列为禁书。

卢梭也开启了西方文化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19 世纪欧洲文化的巨匠或多或少都受到卢梭的感染,如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席勒的戏剧,歌德的小说等。康德称卢梭是“道德世界的牛頓”;叔本华将卢梭比作“最伟大的现代伦理学家”,他这样评价卢梭:“他穷尽其智慧,洞悉了人类心灵深处的秘密。不但反映在其著作里,也体现在他的生命中。正因他拥有真理,从而激荡人们的心灵。”

卢梭认为,最能体现人的独立性的是孤独者。孤独者不同于哲学家,孤独者从社会中逃离不是为了去思考,而是为了去感受。文明人要想回到原始状态,必须经由情感而非理性。孤独者把自己视为社会的良心,更像托尔斯泰式的人物。在卢梭看来,这种个人主义是罕见的、珍贵的品质,在普通人身上很难发现这种特征。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中赞同卢梭的这一观点,他说:民主社会教育人们相互协作,却忽视了人们孤独时成熟起来的美德。

卢梭在他生命的晚期强烈地体验到文明的异化。为此,他躲避人的陪伴,以便独善其身。他的结论是,这个世界没有疗救的希望。他最后的著作是未完成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书中指出:远离文明、躲到偏僻的乡下是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个时代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卢梭的思想在中国也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社会契约论》自 19 世纪末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成为革命者的思想武器。辛亥时期的革命家邹容把卢梭的观点比作“起死回生之灵药”。

然而卢梭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有时需要强迫人去自由。”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写过《论教育》,却把自己的 5 个孩子都送进了育婴堂。他声称自己讨厌革命,却被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等人奉为偶像。他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但同时又说艺术和科学会败坏人的品德。他一生著作等身,却认为书籍毫无用处。

前不久,商务印书馆举办了“纪念卢梭诞辰 300 周年暨《卢梭全集》出版座谈会”。出于对卢梭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敬仰,许多听众冒雨前去参加。

座谈会上,我国卢梭研究专家、主持《卢梭全集》翻译的资深译者,88 岁的李平沅先生认为,“《忏悔录》里全是大实话。他思考的问题超越了国界,关乎全人类的命运。写作《爱弥尔》、《社会契约论》之后,他流亡 8 年,走到哪儿都被驱逐。流亡结束之后,他也没有选择用名望去换取富裕的生活,而是坚持独立写作”。在李平沅看来,卢梭是个不幸的哲学家,他一生遭遇坎坷,几乎每本著作都遭遇批评或禁令,“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卢梭还孜孜不倦地写作呢? 他有一个著名的座右铭:‘我把我的的一生献给真理。’他就是为他的座右铭而奋斗的”。

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则指出:“对我们喜爱的任何一个西方作家,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应像当年那样,把他当做包治百病的良药。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李猛说,中国最早批判卢梭思想的人是严复。梁启超在 1901 年时曾非常赞赏卢梭,还专门写过文章认为民约论是中国的一剂良药。但康有为却认为民约理论过于激进。两年之后,梁启超又写道,卢梭的思想虽是一剂良药,但药能治病亦能生病。王元化先生也曾写过一封信谈论卢梭,认为卢梭的思想太矛盾了。

李猛表示,在研究卢梭的思想理论时,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有一个比较平和的视角,去探讨卢梭的哪些思想可以对我们起到帮助作用,“对于卢梭这样一个具有伟大智慧的人,尚需更全面的解读”。

这或许代表了今天人们看待卢梭的态度。其实不只是卢梭,100 年来,我们对西方思想在不断地进行理解与接受。今天,对其他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也许都应该用更平实的态度去面对。

编者按:

今年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诞辰 300 周年。300 年来,这位孤独漫步的哲人对世界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报约请了两位卢梭研究领域的专家,对卢梭思想的当代意义进行解读,让我们一起重新触摸卢梭丰富的心灵。

三百年诞辰话卢梭



■李强

对于今天中国的读者而言,卢梭的名字并不陌生,但这种情形在几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清楚地记得,我 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尽管我的专业是政治理论,但当时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接触实在是少得可怜。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读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本小册子深深地打动了。我至今都记得当时阅读卢梭那些险象环生的名句时的激动:“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了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

阅读卢梭的著作使我有一种突然受到理性之光照耀的感觉。我多少年来苦苦思索而得不到解答的一些问题有了答案。我对人生、自由的价值、社会与政治权力的基础有了新的理解。后来,我读到康德关于启蒙运动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我才领悟到,我阅读卢梭时的感受,就是一个人受到启蒙时的感受。

卢梭被不少人视为 18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确实,就政治与社会影响而言,他远远超过休谟、柏克、斯密等同时代著名思想家。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又是浪漫主义之父。他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锐,有超乎寻常的理论洞察力,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理解与关怀、对人类理想制度的创造性思考奠定了他在近代思想界的重要地位,使他成为近代以来为数不多的可以比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政治哲学家。

卢梭的思想既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也一直引发争议。卢梭政治哲学中最具影响与争议的是两个核心要素,其一是他的激进主义思想,其二是民主权利理论。

卢梭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的乐观主义。它对人类理性能力高度自信,它相信世界的存在是有序的,人们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认识世界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改造这些秩序。它认定,人类的痛苦并非来自人性本身,而是来自罪恶的社会。只要改造社会,罪恶与痛苦就会最终从人类消失。恩格斯在分析法国启蒙思想时曾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启蒙思想中所包含的独特的理性主义特征,恩格斯称之为“理性法庭”。所有现存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与观念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决定其存在的正当性。在理性法庭面前,传统、习俗乃至利益都不能成为自我辩护的工具。

如果我们将卢梭这一思维特征与近代以来的保守主义或温和主义相比较的话,二者的基本政治倾向就会十分清楚。保守主义通常会拒斥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拒斥理性的傲慢,不相信人类依靠理性能够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消除人类社会的一切苦难。惟其如此,保守主义往往对人类社会长久形成的习俗、权威持一种谦恭的敬畏态度,这种思维倾向在卢梭同时代的柏克、休谟的思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激进主义倾向相联系的是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卢梭是近代以来人民主权理论最早的系统阐释者。卢梭理论的出发点是自由。他酷爱自由,他有一句被广泛引证的名言,“人生而是自由的”。“自由”在卢梭的理论中有诸多含义,但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后来伯林(Isaiah Berlin)所称谓的积极自由,其核心是自主。一个成年人应当过一种自主的生活,否则便与奴隶无异。但是,人必须在共同体中生活,必须有权威。如何

既能自主又服从权威? 卢梭设想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契约。在这一社会契约中,每个人全部转让了自己的天然自由,形成所谓公意。公意是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这样,当个人服从公意时,他“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契约,卢梭建立了他的人民主权理论。人民主权制度是唯一可以既建立权威又不丧失自由的制度。舍此之外,一切制度都是不“合法”的制度,都是对人民的奴役。

卢梭的激进主义思想以及人民主权理论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法国大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了人类摧毁旧制度的勇气与破坏力。多少个世纪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旧制度”在人民的力量面前顷刻瓦解,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成为新制度的基础。卢梭的思想激励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整整一代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被尊为圣人。1891 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决议,为卢梭塑造雕像。

由于卢梭的名字与法国大革命有密切联系,卢梭最早受到的批评几乎全部来自保守主义阵营。柏克在《法国大革命感言》中对法国大革命及其精神象征——卢梭的学说发出猛烈的抨击。法国著名保守主义理论家梅斯特尔也把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罪恶联系在一起。休谟的哲学则从形而上的角度给予卢梭式理性主义毁灭性的攻击。

不过,保守主义对卢梭的批评很快便被自由主义的批评所取代。法国大革命后,法国许多向往英国式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开始对卢梭学说进行反思。龚斯当批评卢梭的自由理论实质上是追求集体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托克维尔更将卢梭式民主与多数暴政联系在一起。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主义阵营对卢梭的批评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塔尔蒙将卢梭视为“极权主义民主”的始作俑者,哈耶克将卢梭视为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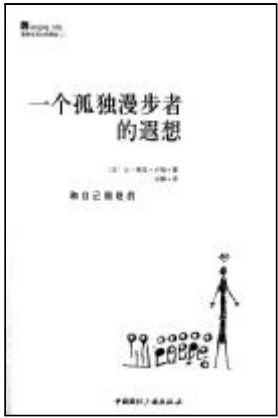
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思想史线索。

卢梭的学说在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卢梭的名字在 19 世纪末被介绍到中国。1878 年,郭嵩焘在《伦敦巴黎日记》中提到卢梭的名字。1882 年,中江笃介汉译《社会契约论》,以《民约译解》为书名在东京出版,风靡一时。1898 年,上海同文书局刻印中江笃介的《民约译解》第一卷,题目为《民约通义》。1900 年,留日学生杨廷栋又根据日译本转译此书,在留日学生刊物《译书汇编》连载,1902 年又以《路索民约论》为书名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

《民约论》的刊行引起晚清知识界的极大兴奋。几年之中,卢梭便成为在激进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家,《民约论》成了革命党人的圣经。著名革命家邹容骄傲地宣称他是“第二个卢梭”。他在《革命军》中以卢梭式的语言宣称人人有天赋之权利,并基于天赋人权号召革命。《民报》创刊号以卢梭画像作为封面内页插图,称卢梭为“世界之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就连较为温和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也把卢梭的思想看做是解决中国问题最好的药方。他写道:“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 ……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

中国激进主义者热烈欢迎卢梭的背后,是对卢梭思想,特别是对其自由观念的强烈认同。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不同,中国激进主义者一般认为卢梭是西方近代最伟大的自由倡导者。他们从卢梭著作中得到的最大启迪是,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如果罪恶政府限制人民的天赋自由,人民应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样的政府,恢复其天赋自由。

当然,并非所有思想家都热情讴歌卢梭。1914 年,严复发表《民约平议》,对卢梭



领略卢梭带来的精神喜悦

■高全喜

我最近几年比较偏重英美法政思想的研究,可能会与关注欧陆思想的学者不同。在卢梭诞辰 300 年之际谈卢梭,意义本身就非同一般。我个人对卢梭是爱恨交加。

卢梭对于人性中的正义与平等价值的追求,对于人世间不合理现状的批判锋芒以及他所展示的人内心世界的深度、广度和敏感性,足以说明他秉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但是,世间的思想有很多种类,其中也多有人性的悖论。人是一个不完善的生命,人在追求美好事物的理想过程中,每每会面临着现实的重负。卢梭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展现了人性的内在张力。

人到中年,我对卢梭的解读已经不是寻找对其终极价值的判断,而是经由他来体验人性中的悖论。人想在世间建立绝对美好的世界是做不到的,人很难在现实世界建立起乌托邦,但人又不甘于满足现状,那该如何呢? 英美思想的可贵就在于它用渐进的方式,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逐渐解决或者修补现实制度的不完美,缓慢地走向较为美好的世界。但人往往又不满足于这种改良主义,在卢梭的激进主义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精神寄托。我以为,在现实的行动中应该

多体会英美的改良路径,而在情感与精神的寄托中,领略卢梭带来的精神喜悦。

一个世纪以来,卢梭的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奇异的影响,发挥了其他西方思想家们难以匹敌的作用。我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以降的社会思想,衍生出两种主旨各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那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卢梭关于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人格平等的思想成为《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但他也是西方反抗现代性的思想源头之一。我们不能说卢梭思想直接培育了极权主义,但二者之间仍然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卢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无疑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平等价值、人权保障等显然是正面的教益,而其激进主义的追求完美的方式,则是值得警惕的。

民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就知悉卢梭,梁启超曾经高扬卢梭民约论的精神。1949 年的《共同纲领》,则把人民主权作为社会主义的立国基础,由此也可以见到卢梭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我感到当今中国,卢梭的平等思想在社会转型期,可能会有更大的传播空间与社会土壤,社会不公、平等缺失、官僚腐败等等这些问题导致的社会不正义的弊



高全喜

端,使得人们很容易在卢梭的著作里找到批判精神的诉求。此外,当今的民粹主义与卢梭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关联。

卢梭确实有一颗追求平等、正义的纯粹美好的心灵,这是内在于人性的无尽宝藏,但他诉求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却值得商榷。由此我们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慨,人性的悖论就在于追求美好的东西却往往导致悲剧的结果。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